

□ 我与清华

年纪轻轻受到组织处分,无疑是当头一击。那时正逢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越“左”越革命,那种会议场面,一生难以忘却。

工作中,我既有“过五关”的喜悦,也有“夜走麦城”的惶恐,甘苦备尝。1959—1969年,为编制铁路黄土路基设计标准图,提供了称之为“裂隙法”的计算方法,正式应用了30多年;又为解决桥梁钻孔桩基础设计规范中一个关键问题,先是验证、引进了称之为“M法”,后又研究提出了称之为“C法”的计算方法,前者已编入多家行业设计规程,应用至今;后者,已被专家写入著作中。

最难以忘怀的是在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三四月间,我有幸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科学化,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讲话温暖人心,鼓舞士气。

此后,我经常应约到工程建设第一

线,充当清道夫、救火队员,脚步从华南踏到塞北,从东海边迈到中西部。对那被迫中途停工的工程,或修改设计、恢复施工,或采取措施、转危为安。对于大量有争议的重点工程桩基检测项目,应用了和中科院电工所、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合作完成的发明专利项目——水电效应法做了重复检测,起到了仲裁作用。1987年7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了我们在广东输电线路工程检测中取得成功的消息,远方的朋友们来电来信表示祝贺。作为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人,我虽然尽力而为,但总感到做得太少。

经历近60年的生活磨练,我盼望大家带着平常、和谐的心态,纯真的友情,再次重逢于清华。让我们牢记朱自清大师的话:“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愿我们怀着快乐的心情,健康乐观幸福地生活一辈子。

2014年9月15日

抚今忆昔话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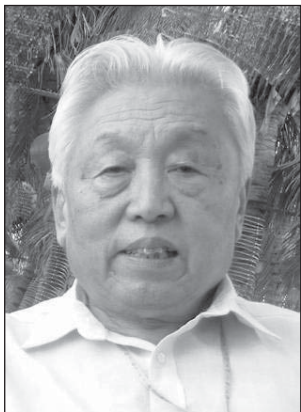
○徐饮周(1953机械)

岁月漫长,人生苦短,转眼间我们都已是八旬开外的老叟了,抚今忆昔感触颇深。我们每个人机遇不同,经历各异,就我而言,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60年前的1953年10月离开清华。此前我是一个热情洋溢、意气风发的青年,毫无顾忌地跟着党干革命,我曾斗志昂扬地参加了宣传抗美援朝的活动,我也曾竭尽全力地参加了思想改

造运动,作为革命的动力来帮助那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我从燕大来到清华,还没上课就被抽调出来到制图教研组做助教,以满足当时学校扩大招生规模之需要。我服从了调动,毫无怨言。1953年我又毅然服从教育部和学校的决定,离开清华调到103部队。当时都没告诉我这是什么单位,报到后才知是哈尔滨军事工



徐
饮
周
学
长

程学院，要我参加新建海军工程系鱼雷专业的工作，我又积极投入了新的工作。不曾想从此刻起，我已经从革命的动力变成了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心目中的思想改造对象，甚至是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我一生中被打作革命对象的第一次政治运动。运动一开始，领导上还是比较和蔼地找我核实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但没有多久就拍起桌子打起板凳来了，有两三个月干脆把我软禁起来，昼夜都有人在我身旁看守。最后运动结束时系领导告诉我说：你的历史已经查清楚了，没有什么问题，结论是“历史清楚”。我问他，为什么结论不写“历史清白”呢？他笑了笑说，你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历史没问题，只能下“历史清楚”的结论，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能说是“历史清白”。这话我是第一次听说，让我领会了在他们眼中阶级出身有多重要。从那以后，每次运动都少不了我这个“种子运动员”，也就不奇怪了。

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期间我都没有在学校，而是在华东的舟山参加潜

艇鱼雷指挥仪的验收工作。没有参加过大鸣大放，按理说就根本扯不上右派问题，但是在1958年学校宣布右派分子名单时，我却名列其中。这不仅令我不解，就连我们的教研室主任也觉得莫明奇妙，他曾经问过海军系的领导，领导的回答是：因为前期划定的右派数量没有达到中央的要求，所以又增补了一些，徐饮周就是增补的，是根据他早先在一些政治学习中的发言定下来的。后来在1979年进行错划右派改正时，果然见到在我的“罪证”档案中有一条：“在政治学习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其根据就是我曾于1954年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说过“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而这句话根本就没有错。我的其他所谓“右派言论”也是与此类似的一些牵强附会之词。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就被关进了学校专设的集中营（这也是军校的特点吧），那里总共关了150多人，营房四周有铁丝网围住，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昼夜巡逻。我们在这种环境里的心情可想而知。1958年的7月左右开始发配右派，因时值大跃进高潮，各地都需要技术人才，我们中的一些教员才免去了到乌苏里江畔密山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厄运。后来得知由哈军工发配到那里的干部和学员中有几个人竟因饥饿和劳累而死。

我被发配到了齐齐哈尔的一所化工学校，任务虽还是教书，但性质却是一个被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学校对我们的管理相当严酷。我每周有六个上午的教课任务，两个下午是政治学习，其余的四个下午是辅导答疑的时间，唯一剩下的星期天，也安排我上午清理室外厕所，去掏净一周积

□ 我与清华

存下的粪便。只有星期天下午可用来搞个人卫生,晚上还要写出一周来的思想汇报,星期一交到党总支。遇到一个学期没有课程的时候,就把我送到学校的农场中去干农活。农场设在离齐齐哈尔 60 多里地的卧牛吐村,是一个达斡尔族人聚居的地方,村子四周三十里地没有人家,那里是北大荒,也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堪称世外桃源的地方。虽然干活有些累,锄地时早晨 4 点下地,晚上太阳落山之后才能回来,一天要劳动 14 个小时左右,但我还是宁愿到这个远离阶级斗争的地方来。

1962 年,我的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了,恢复了自由身,1964 年调到了哈尔滨电工学院,但“摘帽右派”实际上还是个二等公民。1965 年我被派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 年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又被“造反派”投入了关押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牛棚”,任务就是接受批斗,交代自己的“问题”。我在牛棚里面不仅精神上受到了冲击,而且肉体上也受到了折磨。造反派们在提审我的时候动辄对我拳脚相加,以致我的耳膜被打穿了孔。那时候我的儿子才两岁,爱人在外地工作,困难情况可想而知。直到 1969 年 4 月我才被放出牛棚。1970 年春,我全家又被下放到黑龙江的偏僻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在一个全省最落后的生产队,而且还是大骨节病发病的地区,一住就是三年。那里没有电灯,也听不到广播。我在那里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掌握了农村的各种农活,从春种、夏锄、秋收到冬藏,我都经历了,还担任了生产队的车把式,负责赶马车。每年秋

收后,我赶着马车往公社送公粮,还要在公社的粮库里,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扛到离地十多米高的粮囤上去,那几年我的身体倒是得到了锻炼,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吧!

1973 年底开始“落实政策”,我们才被送回哈尔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拨乱反正”,到 1979 年我的错划右派问题终于被原哈军工驻哈留守处正式地“改正”了,我也终于走到了此生的第 2 个转折点,从此彻底解放了。不过坦率地说,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只是“改正”而不是“平反”?为什么没给我补偿工资损失?为什么承认 99% 的右派是错划的,却又说当年有必要反右?

好了,不想再多说这些已经过去几十年的心酸往事了,我知道同学们更想知道我后来的情况。从 1955—1979 年,在一连串“阶级斗争”的折腾中,我损失了 25 年大好的青壮年时光,一旦解放就想只争朝夕地加倍努力工作。在 1990 年我退休之前的十年里,我在哈尔滨理工大学除了日常教学外,还写出两套教材、一本词典和一本手册,共约 250 万字;翻译了近 50 万字的外文资料。我还担任了连续三届省政协委员,全国制图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工作。工作比较辛苦,但过得十分充实。

退休后我生活得很愉快,身体状况也还算好。我有三个子女,两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都过得不错。姑娘在三亚给我们老两口买了一套房子,每年冬天我和老伴儿都到三亚避寒,四五月份再回到哈尔滨避暑,这样已经有六七年了。我觉得我现在活得很幸福。

我觉得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高低和人的心态很有关系。我是比较想得开的，从不为一些烦心的事纠结，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应对。回想在“文革”期间和我关在同一个牛棚里的人，有的想不开就喝了敌敌

畏，有的用头撞暖气险些送命，这都不值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对自己、对生活失去信心，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定要善待自己，享受人生。

我为他们骄傲

○王治祥（1964 动力）

1966年“文革”兴起，清华是重灾区，包括清华在内的所有高校都停止了招生。1970年上半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清华北大几所高校恢复人才培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符合条件的青年进入大学学习。清华总算又开始培养人才了，在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无用”、斯文扫地的年代，尚有一批渴望学习知识的青年人能够跨入大学门坎，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些工农兵学员，他们进校前的文化知识水平的确参差不齐，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都非常珍惜这学习的机会。因此，大部分同学都能够克服学习上的重重困难，努力取得好的成绩。

1970年，我正在清华200号（即现在的核研院）从事一个新型反应堆的研究工作，曾经为在200号的工农兵大学生讲过一点课。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海军，少部分来自核工业系统，还有的来自延安和榆林。当时的培养目标，就是为我国海军和核工业系统培养核技术人才。由于我当

时还年轻，在清华当过几年辅导员，与他们年龄差距较小，因此关系就比较好，互相也比较了解。他们毕业后也和我还保持了一些来往，个别的甚至成了忘年交。

虽然学习基础较差，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这更增添了他们的学习激情。他们知道到200号来念书，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国家稀缺的核技术人才。我欣喜地看到，自从有了这批工农兵学员，清华校园好像又开始复苏了，远在燕山脚下的200号也是如此。200号厂区内，在晨曦微露的树影下，又传来了大学生们朗朗的外语声，虽然没有纯正英语那么悦耳，却好像演奏了一曲动人的乐曲；在资料室的座位上，又挤满了刻苦攻读的大学生；在学生宿舍的窗下，又见到了深夜不灭的灯光。在食堂排队买饭的队伍中，又看到了手拿书本默默思考问题的学生。这些，跟我们念清华大学时候的情景完全一样。

有一次，我给他们讲温度测量仪表，我讲到：热电偶、热电阻和辐射高温计，是三种不同的测温常规武器。到底是军人出身，他们对“常规武器”几个字特别敏感，对这三种常规测温武器表示了特殊的兴趣，非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听说热电偶体积小，特别适合于点测温，兴趣就更大了。特别是对铠装热电偶，则更加钟情，因为海军舰艇希望检测仪表尽量少占用有限的舰艇空间。反正什么有用，就对什么感兴趣。